

梁晓声

祖籍山东，1949年出生于哈尔滨。代表作有《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》《今夜有暴风雪》《人世间》等，获第十届茅盾文学奖。

著名作家、花地文学榜评委鲍十(左)和羊城晚报报业集团党委书记、副社长李和平(右)，一起为梁晓声颁奖



【感言】

分享文学带来的暖意和诗性

□梁晓声

我与羊城晚报花地的缘分不浅。大约在10年前左右，我给花地副刊的负责同志写过信，谈到应该在副刊上提振短篇小说和市民读者之间的关系。而且我不但写了信，还真的这样进行了创作。我连续给副刊写了数篇作品，每一篇都有五六千字，在羊城晚报几乎是整版刊发，这几期短篇小说的转载量也很大。

我和深圳的关系也很亲近，来过多次。前段时间，我的作品《人世间》被改编成电视剧，导演要我加一些旁白词，其中有段情节是东北的一位副市长到深圳所产生的各种触动。我写

也希望自己就是什么样的人。所以我一直愿意写好人。

在当代，以一份报纸和一座城市的宣传部门来操作起一份纯文学奖项，坚持数年、卓有成效，花地文学榜可能是国内唯一的。希望羊城晚报和深圳市委宣传部的那一联袂，对文学的提升能继续下去，越做越好，在明年、后年有更多的同行相聚于此，和大家分享文学带给我们的那些暖意和诗性。

(文字整理/羊城晚报记者 李天军)

年度短篇小说

梁晓声：我爱的不是市场，是文学

【专访】

文/羊城晚报记者 朱绍杰 吴小攀 实习生 张雯

1 从儿童和“非一线”的视角表现抗疫

羊城晚报：《可可、木木和老八》写的是2020年春节，您为什么会以此为题材写这部作品呢？

梁晓声：首先要谈下疫情，我曾经经历过2003年的SARS疫情，但那时候正好学校放假，我在大学里也没有感觉到太紧张。而此次新冠疫情是世界性的，它让每个人都异常紧张和慎重。从武汉抗疫，到后来其他城市，我关注全国强大的医疗系统驰援背景，这是我们国家体制优势的体现，我对这种良性力量有很深的体会。作为作家，我觉得应该用文学的形式记录这一大事件下的人们，应该对那些奔赴抗疫一线的医护人员表达尊敬。

实际上这方面的作品并不少，有绘画、歌曲、影视、诗词等，但是选择儿童视角来记录此次疫情的相对少，至少我没有看到过。所以我就在写一系列儿童题材时创作了这个短篇小说，这完全是出于一个作家的使命感。我们说，作家是时代的书记员。

羊城晚报：您刚才讲到疫情下的其他文学创作，其实比较多

的还是“再现”，颂扬在一线的医务人员、志愿者、逆行者的，但您的作品好像不太一样。

梁晓声：我实际上是从“远离”现场的角度来写的，表现那些不在抗疫一线的儿童和老人的心理，角度比较特别。我写作首先是拾遗补缺——大家都在呈现什么？别人是怎么呈现的？还可以怎么呈现？当你问到第三个问题，就是留给自己的，我还可以从这个角度呈现。

“颂扬”体现了文学的功能之一，即对事实的宣传，这比较接近报告文学或者新闻报道。我的作品不是那么直接，我没有谈到那些事，只是通过孙女和爷爷的关系，以及他们和一条小狗、一个小八哥之间的故事来进行呈现。

2 我的文学不是碎片化的

羊城晚报：除了短篇，您还有很多长篇作品，包括荣获茅盾文学奖的作品也是长篇小说。现在写长篇，您会不会感到有挑战？

梁晓声：是体力上的挑战，有时写长篇到最后就变成了体

力活。因此我现在做的，差不多就是退场的事情：把自己的一些想法都再反复掂量一下，一是看它值不值得再写，二是看素材是否足够去写。如果掂量来、掂量去，还是不值得写，那么就让它过去，永远不去想了；如果确实还值得写，那就像一个老木匠的木工坊要关张，关门之前再看看，有哪些能用的木料，还能做什么，做完了就关张。就是这样的一个退场准备。

羊城晚报：今天的文学界存在对长篇小说的崇拜，很多作家追求以长篇小说来确定自己的位置。但在当下，创作短篇小说这种适合轻阅读、碎片化阅读的文学作品，又符合时代的某种趋势，您怎么看这样的现象？

梁晓声：我不认为这会出现问题。对于文学来说，永远需要短篇、中篇、长篇来兼顾不同领域。短篇小说的兴旺与报刊业的发展有关系，报刊需要短篇，那时候就是短篇的黄金时代，也就是市场需要它。只是后来这些平台很多都消失了，文学刊物也在萎缩。

作家们有擅长其中一种体裁的，也有三种都喜欢、都擅长的。像我的话，短篇奖得过、中篇奖得过、长篇奖也得过，因为

都比较喜欢。我们最初都是从写短篇开始，然后又开始写中篇、长篇，我认为作家不会受到多大影响。

作家是些什么人呢？我不认为，你们碎片化了，我就要跟着你们碎片化。一个尊重自己创作劳动的人，不应该是那样的人。你们都碎片化好了，请你们碎片化去得了，但是我的文学不是碎片化的，我爱的不是市场，是文学。

3 年轻时关注“事件”，现在更多的是“日常”

羊城晚报：您现在的创作与早期有什么不同？

梁晓声：创作状态和视角都不同。我在比较年轻时，眼光尽量放得很远，创作格局也很宏大，更多关注到“事件”。但同时眼光也可以收回来，收到身边人、寻常人的日常心态中来。而我现在的生活，平时几乎没有任何事能够构成事件的，只有平淡的日常。

换句话说，作家就好像是一个指挥者，内容就是那些乐器、那些乐曲，指挥者可以指挥交响乐，也可以指挥室内音乐、轻音乐。作家在内容的发挥上

处于主导地位，要让自己的能力更全面一些。

羊城晚报：您这一代40后、50后的作家有什么特点？

梁晓声：我们大部分曾是知青，都多少写过和知青有关的作品。这一代作家都经历过相当纯粹的创作过程，就是几乎没有稿酬的阶段，这与当下总想着这个作品能不能大卖、那个作品能不能改变命运的作家不太一样。当年的作品，你一看品质，立刻就会感觉到那些作家写作时跟市场没什么关系，他的心放得很真实，体现的是作品与生活的关系。可能区别就在这。

4 向文坛转过身去，忘记曾经是作家

羊城晚报：您被称为中国文坛的常青树，您是如何保持这种创作力的？

梁晓声：动力最初肯定是热爱，也热爱得奖，得奖之后是成“家”、成为一个好作家，后来是要保持好的名声，再后来也要多赚点钱……这也就是动力。但我从大学教学岗位退下之后，到写《人世间》时，就跟这些都没关系了。我做了一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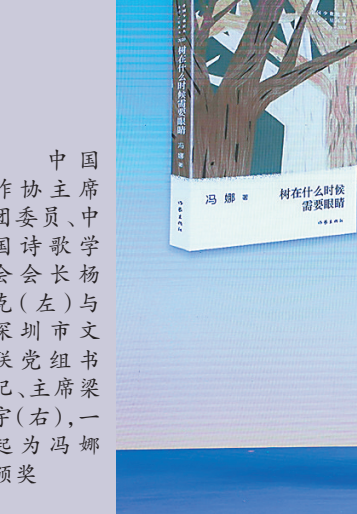
子这个行当，现在要退场了，要将我的这个场子清理一下，最后再写一个自己比较满意的作品。别人是怎么样、市场怎么样、评论家怎么样，我都不管，就做了一件却自己心意的事儿。我现在写作，就是纯粹面对自己的那种文学，把这事儿做完，然后赶快退场。

羊城晚报：您在这么多年的创作生涯里，会担心重复自己，或者陷入某种惯性中吗？

梁晓声：我没有重复。影视或许可以有一定的重复，连续一、续集二……什么都是可以连续，美国电影都是这样，只要市场好，就接着搞，剧作家可以趁这个热乎劲儿，接着写。我没有重复，可能关于知青题材略多一些，但内容也不重复。

羊城晚报：您在写作过程中有没有觉得“不想写了”？

梁晓声：我现在就有。我这个长篇写完之后，退场的事基本上可以大功告成，也不一定说去做个宣言去封笔，要留点日子给自己吧。也就是彻底向文坛转过身去，忘记曾经是作家，忘记文学，只保留自己是一个读者，看看电视、看看书、散散步，我就做一个老人，也跳跳广场舞就可以了。



【感言】

“只有风是对诗人的奖赏”

□冯娜

感谢花地文学榜、感谢各位评委将沉甸甸的诗歌奖颁给了正走向“不惑”之年的一个诗人。我倾向于把今天这个奖看作是颁给诗歌这一古老而又崭新的文体，是对长期持续写作的诗人的一种满怀期待的注视。

在新的科技和传播媒介不断涌现的今天，过去的言说方式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，诗歌的传播似乎进入了一个“万花筒”似的奇妙新世界。但人们仍对诗歌寄予了一些最本质的渴望：爱、沟通、理解、信任和良

知。无论我们的语言在时代中如何演化，无论我们的技能如何迭代，人类心灵深处的故事与千百年前的祖辈并没有什么不同。

我分享一个小故事，就在前几天，我请一位家政阿姨帮忙清洁家居，我在网上给学生讲课。讲完课阿姨跟我说她听进去了，她被讲课的内容打动了！那天我讲到苏轼的生命与他的诗文是如何融为一体；也讲到国破家亡之后，一个诗人是如何看待暮雪千山。这就是伟大的诗歌传统

给予我们持久的感动：诗歌不仅是在人生际遇中的感怀和喟叹，更是人格完善、自我完成的一种要求。文学也不仅仅是个体的精神事业，它更是通往更广大时空的一种努力。

为此，我也时常反观自身，我所做的微不足道的事业是否配得上我所获得的荣誉；我的德行是否匹配了我的诗歌。茨维塔耶娃曾说，“只有风是对诗人的奖赏”，风声不息，诗歌不尽。

(文字整理/羊城晚报记者 孙磊)

冯娜

1985年出生于云南丽江，白族，中山大学博士生。著有《无数灯火选中的夜》《是什么让海水更蓝》等诗文集、译著十余部。获第十二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。

年度诗歌



冯娜：做一个诗人很幸福很幸运

【专访】

文/羊城晚报记者 孙磊

1 对诗歌和现实的双重误解

羊城晚报：您是如何看待网络热词的？

冯娜：一个“热词”之所以流行，是因为大家都在用。所以我们每个人对当下语言的演化都负有一定责任。语言简化的背后是思维的简化，说明我们“顺从”于这种快餐式的文化，导致我们也不愿意深度思考，难以再面对丰富、艰深、委婉的语言。

我们应该对这种简便的东西保持警惕。当代诗歌也一直在探索，什么样的现代汉语能够真正表达我们当代中国人的精神气质、内心世界和日常生活。

羊城晚报：有人说生活在钢筋丛林、格子间的现代人是没有诗意的，甚至认为当下种种现实无法被诗歌所书写。

冯娜：我想这是对诗歌和现实的双重误解。《诗经》所书写和表达的也是当时的现实生活，并非只是农耕时代岁月静好的歌吟。跟古代相比，我们的生活方式、技术手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剧变，但并不是本质上的改变。

2 人在“物”中该如何自处

羊城晚报：常年在城市生活，您有感觉故乡在慢慢消失吗？

冯娜：今天回到我的故乡丽江，你会看到极度商业化的景象。不仅我的家乡如此，很多地方都存在这个现象。

早在1967年，法国学者居伊·德波出版了一本重要著作《景观社会》，论述了一种社会形态：“整个社会生活显示为一种巨大的景观的堆积”，也就是“物”的堆积。

我们今天面对的景观就是如此。这也促使我们思考一个问题：在这个消费主义、物质文化崛起的时代，人类何去何从，人在“物”中该如何自处？

人类创造物质的初衷是为了物为人所用，但是今天你看到的往往是人被物所“役”。有人提出一个词“物质伟力”，我觉得这个词很可怕，就是说物质的力量已经达到了一个“伟力”的程度，人在“物”中已经被挤压而坍塌和萎缩。

羊城晚报：在文艺复兴时代，人是有力量的，伟大的。

冯娜：14-17世纪的文艺复兴之所以伟大，是伸张了人的尊严和价值，肯定了人的创造力和主动性。

我觉得我们现在需要重新审视人的位置。我们的文学和艺术其实也在不断书写、探索这些东西：人类共同的处境和命运、个体的梦想和困惑……人在世界上如何彰显自己的力量，每代都不一样，譬如现在很多高科技领域，也彰显了人强大的创造性。

羊城晚报：但是现在信息过载，很多人的注意力也有限，一个诗人走入大众视野总是伴随着各种争议或吸睛的话题，比如余秀华等。

冯娜：诗歌写作和诗歌传播本身是两回事。一个创作者本身并没有义务和责任成为传播者。但是随着大众传媒的兴起，文学作品传播的范围和方式越来越广，我们的读者也是多样化的。诗人和作家难道要直接进入每个传播环节、去面对所有的读者吗？我想大可不必。

余秀华等所引发的争议，其实已经脱离了文学本身，而成为一种文化现象，跟她们的诗歌本身没有必然的联系。

3 我真正的写作还没有开始

羊城晚报：您说您没有影响的焦虑，是因为您的创作已经有了成熟的风格和路径吗？

冯娜：我不这样认为。“影响的焦虑”主要要看是什么样的影响，产生了什么样的焦虑。对于外界施加的影响，有时也可能成为我们创作的动力。但是，我们必须客观地看到，很多作家会有较强的“中年危机”和困境，根本还没形成中年风格或者晚期风格就不再写了，非常遗憾。

我曾和朋友说过，我觉得我前期所有的写作可能只是一个学徒期的准备，我真正的写作还没有开始。

羊城晚报：会一直坚持写诗歌吗？除了诗歌之外你还有其他体裁的创作吗？

冯娜：当然会。从事诗歌创作对于个体而言，是对自我的一种拯救，把自己从庸碌的工作和茫然的困境中拯救出来。诗歌和文学很多时候是帮助你认识

自己、认识他人、了解世界。能一直做一个诗人，我觉得很幸福也很幸运。

羊城晚报：近来有人提出新诗又到了一个新的时代转折点，应该走向广阔的社会、现实，拥抱时代，您怎么看？

冯娜：我觉得似乎并不能清晰地界定某个时空。大家都在共享这个时代，我们都是同时代人。诗人曼德尔施塔姆说，“我从不是任何人的同时代人”，意味着我们的写作必须有超越。就像今天我们读《诗经》，还是能感到心动和共鸣，我们就是《诗经》在“未来时代”的知音。”

一个作家和诗人还是应该把目光投得更远一点，不仅看到我们眼前的事物，更应看到我们在未来时代会不会有回响，或者说我们能不能为未来时代的读者记录一点什么。

4 考试是诗歌教育重要的指挥棒

羊城晚报：这六七年来越来越多从事诗歌教育，为什么如此关注这个事情？

冯娜：这项工作非常重要。中国古代的诗词教育叫作“诗

教”，诗教的目的在于培养具有君子之德的人物；诗教不仅是审美教育，更是一种人格教育。今天我们的诗歌教育课堂，也不单是讲诗歌如何鉴赏、诗歌写作有哪些技巧和方法，它更是关于审美能力培养、人格教育的问题。

中国人的审美教育有待提升。现在时代在进步，人们也有了这种意识和觉悟，也有一些人愿意投入心力积极去从事这些工作。一个民族的审美感受力和创造力，不是一代人就能完成的，要一代又一代的人持续不断地去做这门功课。

羊城晚报：现在考试作文都明确规定“诗歌除外”，我们该如何进行诗歌教育？

冯娜：的确，诗歌教育除了诗人的推动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指挥棒——教材和考试。这个问题其实也有它的现实困难，一方面因为诗歌的标准很难界定；此外，我们诗歌教育的基础还比较薄弱，无论师生都会有“畏难心理”；为了避免出现各种争议，只好规定“诗歌除外”。

另一方面，考试不考诗歌并不意味着我们不学诗歌。当下中小学的课本中，不仅有古诗，也有很多现代诗歌。

《树在什么时候需要眼睛》

【致敬辞】

借助女性的直觉，冯娜用诗歌发掘人类的共同情感，敞开照亮了属于这个时代的诗性。诗集《树在什么时候需要眼睛》，既有其多民族聚居区经验的诗性言说，也有对当代文化的与生活谦卑的内省与深度的发掘，兼具对人类的命运的关注和深情思索，呈现出典雅、深邃、纯粹的诗歌品格。

对于世界孜孜不倦的探索，对人类苦难悲悯具悲悯意识的观照，使得冯娜的诗歌充满了爱和智性的光芒。